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七六八期 ——
(二〇一〇年九月二十一日出版)

本期目录 (zk1009d)

【往事非烟】	乱云乍起——《一叶一菩提》节选	萧 默
【人物春秋】	靠上海写作组“造反起家”的徐景贤	朱通华
【自由论坛】	罪名与文革——文革思想遗产断想	顾 土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museums.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投寄 tougao@cnd.org。请在 subject 中标明 CR 字样。

【往事非烟】

乱云乍起——《一叶一菩提》节选

• 萧 默 •

—

文革轰隆隆来了，幸好，初期大家乱揪乱斗的时候，有赖于赖子隆团长的保护，我得以置身事外，安然度过。1966年冬天回所以后，却面临着这么一个奇特的景象：工资照发，食堂照样管饭，而工作全无。何山是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壁画系毕业生，比我小四岁，1964年才来到所里，因为家庭出身稍好，被工作组相中，火线入党。原被工作组指定的所文革小组组长贺世哲被揪出来以后，由何山顶替了，并代理所务。但这时，随着工作组之被否定，这个领导权威，也没人承认了。党支部书记李承仙和其他四位委员中的两位：所长常书鸿、办公室主任王佩忠都被打倒，贺世哲也是支委，此时虽否定了工作组，却没人给他平反。支委只剩下一个木匠苏永年，不知道支部是不是还活着。总之，整个一个无政府，真是“东风吹，战鼓擂，如今天下谁怕谁？”我自上中学接受党的教育起，一直被灌输的就是加强组织性纪律性这些观念，已经根深蒂固了，现在，作为党报的《人民日报》却号召我们要彻底摧毁“黑组织、黑纪律”，领袖也说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副领袖说，正领袖的话一句顶一万句，我们就按这“一万句”去办，想必不会错的。所以，大家也就乐得像老Q当年那样，不妨也“革”他一回“命”，“造”他一回“反”，谁也不听谁的了。好在，这个时候也没人再下命令。

但包括吃喝拉撒开门七件事等等事情总得要有人管，可这些都轮不到我操心。总之，我至今也不明白当时是个什么样的“体制”，怎么个运行的。反正，我想，就这么过下去，倒也好玩。

贺世哲之被工作组揪出是我万万想不到的。天天盼星星盼月亮地盼着革命早点到来的左派、所原文革组长贺世哲被公开揭发，公开批判，最后得了个“党员不予登记”清理出党的结论，悲愤满怀。施萍婷虽然被宣布“免予处分”，也已经大伤元气。虽然这些都是工作组干的事，现在也都不作数了，但他们曾经有过的居高临下唯我独革的姿态，却再也不见了。

而最令我想不到的是，贺世哲之被揪出，竟是“老右派”高尔泰造成的。高尔泰借着工作组令他写交待材料的机会，“检讨”自己曾经反对过文革组长贺世哲的“错误”，似乎是“顺带”地把贺、施私下给他谈过的一些话写了出来，故意引起工作组对贺的怀疑。领袖多次告诫我们要相信群众相信党，但当此之时，当群众一看到代表党的工作组的脸色变了，立马也就变了，七凑八凑，居然凑出了贺的好多“言论”，真的是跳到黄河也洗不清了。

当发生这些事时，我都不在所里，现在回来，隔岸观火，有如时空错乱，一句话，糊涂了。

而在我意料中的是常书鸿、李承仙、王佩忠和高尔泰之在劫难逃。他们以后被简称为“常李王高”。当然，常老的“新洞窟”计划必然也是常老的罪行之一。工作组虽走，大家也公然目无王法，他们却不敢乱说乱动，日日在所里劳动，不敢稍懈。所里在南边山沟里有几十亩地，那时还是租给农民种，他们没有去过。

1966年8月18日领袖第一次在天安门广场大规模接见红卫兵，三个月稍多一点，一共接见了八次，规模大者达到250万人，在全国掀起了一片革命大串联的热潮。研究所属于文化教育系统，也有权串联，大家看着当下的局面，反正，“下雨天打孩子——闲着也是闲着”，不知道是谁第一个提出来的，于是，一窝蜂地又全都出去串联了。说好是路费自己先垫着，回来以后会计给报销。当然所谓串联也是各怀目的，贺、施肯定是要到北京向中央文革告状的，我无状可告，想想在上海的弟弟萧功秦，自我工作以来至今已经五年多不见面了，何不趁此良辰，也“串联”一番，顺便再逛逛别的地方。于是先到了兰州，见到了我的女友。她姓和，以后便称她“小和”吧，在书店工作，归文化局管，勉强也算个文教单位，也正在酝酿串联。可惜她胆子小，不敢像我这样目无王法，我只好一个人到了北京，住到美术馆楼上展厅，与所里来京人员会合。我趁机偷偷溜回学校一次，到了系馆，看到贴满了梁思成先生的大字报，还看到梁先生被穿上戏装挨斗场面的照片，就谁也没找，谁也不敢找地走了。在京看了几天热闹，觉得既好看又不好看，便南下长沙、湘潭，沿途都有接待站，有地铺可睡，糙米饭可吃，全不要钱，最后到了上海，住到姑母家里。

后来我才知道，我离开北京以后仅一天，小和也来了，到美术馆找我，遇到施萍婷，说我刚走，不知道到哪儿去了。当时没有手机，不能及时联系。这确实是一大憾事，要不然，在这个全国一片热腾腾乱哄哄的当儿，我们结伴云游，提前先过一次准蜜月，岂非人间一大乐事。

小秦弟其时正在闵行区上海第一齿轮厂当工人。他本来学习就好，中学时一篇作文写的是对一首交响乐的分析，老师也读不懂。1964年高中毕业，面临的局面已不像我55年考大学时还不那么太严格的强调出身，而特别重视家庭出身了，因此与大学无缘，当了工人。

朱学勤先生在《南方人物周刊》2005年某期发表的《吾敌吾友萧功秦》中描述过他那时住的地方：“在他虹口余杭路的老宅二楼，那时他的窗外正好面对着一个巨大的垃圾箱。萧说，他每天早上不用闹钟，可以准时被这个垃圾箱的臭气‘臭醒’，他的处女作《儒家文化的困境》正是在这种‘困境’里完成的。”

但我看小秦弟虽没上大学，却自得其乐，我这个作哥哥的似乎还有点歉意，他却丝毫看不出有什么遗憾，高高兴兴地当他的电镀工，高高兴兴地仍然读着他的书。在上海，我们还一起去到他在齿轮厂的工人同事陈文乔（以后在美国获得了博士学位）在城里的家，打开留声机，偷偷听了全套《天鹅湖》。2005年陈文乔先生在美国逝世时，小秦弟写了一篇纪念陈先生的文章《他坐在高高的山顶上》，回忆了他们在上海第一齿轮厂的生活：“在齿轮厂的十二年里，我们可以说是朝夕相处，有好几年同住在一间宿舍里。每天晚上，我们各躺在自己的床上，开始了风雨对谈，从小说到历史，从科学到哲学，谈论着我们都非常喜欢的苏联作家的长篇小说《多雪的冬天》、《叶尔绍夫兄弟》。我们宿舍里同住的还有一位热处理车间的师傅‘老山东’，总是在车间对别人说，一到晚上关了电灯，咱们宿舍里，陈文乔与萧功秦的‘克思闲话’就开讲了。在齿轮厂里，我被称之为‘萧克思’，陈文乔被称为‘陈克思’。一开始我们很不喜欢这个称呼，后来也只能习惯了。我们正是在这样的枯燥环境里，在充满对知识的热爱的‘克思闲话’里，度过了漫漫的‘文化大革命’的冬夜。”

萧功秦此时有幸没有沦落为臭老九，反到荣升为领导阶级。与领导阶级串联，大概不能算是罪过。

姑母从教师岗位退休在家，还是老样子，只是略显惊惶。问她，她说街道开会，她总是不说话，逢到表态场合就积极表态，还算平安，平时只在小房间里画画，听广播。

我去到上海时，上海正在热烘烘的搞什么“一月风暴”，张春桥、姚文元策划王洪文的工总司，夺了上海市的党政大权。《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支持上海的夺权，号召全国向上海学习，建立革命委员会，夺权之风刮遍全国。

我看不懂，也没兴趣，反正什么权不权的，全都与我无干。

二

回到敦煌，已是1967年2月，所里有些人成立了几个“战斗队”，小者只有两个人，大者也不过三四人，我没有参加。三月间有一天，有五个战斗队联名在县委礼堂举行了一次控诉工作组罪行的公开会，参加的人很多，包括他们串联的本地红卫兵，还有自动来的，因为地点在县委，来的党政干部也不少。会上，以为贺、施二位抱不平的发言为主，我觉得有理。但他们除了为贺、施喊冤外，并不为其他受到过工作组冲击的人说话，话里话外，反而指责工作组轻轻放过了常书鸿，声称要彻底打倒“常家天下李家党”，矛头并指向曾揭发过贺先生的群众。突然，一位公安干警站起来，底气十足地大喊一声，说：“我，牛虎林！”，指着我的顶头上司、保管部主任、一向工作认真负责从不得罪人的孙儒简先生，称这个会有问题，《公安六条》规定的专政对象也来了。立即有几位红卫兵起来与他辩论，嚷成一片，口号声四起，孙先生退出了会场。我气不过，也离开了会场，在新华书店门口见到孙先生，我说，你干嘛退出会场。你早已经摘帽多年了，应该算革命群众，有权参加批判资反路线的会。他强压住委曲，幽幽地说，我就算了吧！这件事的影响不小，从此，所里凡是有类似历史情况的人，不管曾经有无帽子，在整个文革过程中，都处于无声状态，不参加任何战斗队，不发表任何意见。

这次会可以说在敦煌也产生了很大影响，是全县以后形成两派的先声。一派以中学红卫兵为主，持较左的立场；另一派以党政干部组成的“党政兵团”为核心，以“保卫四清运动伟大成果”为旗帜，持稍微理性的立场，当然也以“左”的面目出现。

我对那两位一向反常书鸿的人士持有戒心，多年来他们一直在反对常老，文革到来以前就

相当的左，而我对左的东西，一向是讨厌的，所以，对这个会的倾向性总的来说并不认同，但也不完全否定。

会后我没有回所，住到城里一位朋友家，我在城里的朋友很多。敦煌城本来就不大，从东头到西头，多数门脸里都有我的朋友。为什么不回所里去，主要是想当一个逍遥派，我既然并不完全认同这几个战斗队，而根据当前全国狠揪当权派的大形势，对于常老也完全无所用力，对林彪“刮他10级、11级、12级台风”的号召更觉讨厌，那么，逍遥就是最好的选择了。

正好，文化馆馆长天津人荣恩奇告诉我，县武装部正在抓春耕，我们能不能凑几个人，搞一个小演出队，配合一下呢？我觉得挺好，既名正言顺，又可以不回所里去，远离是非之地。老荣有人缘，很快就组织起来了，成员包括原敦煌剧团的和几个单位的年轻人，也有研究所的两三个人。女的主要是县城两所小学的老师。我会拉手风琴，当然用得着。

这时敦煌还没有县革委会，原县委县政府都已瘫痪，县委书记王占昌此时正面临红卫兵的揪斗。这年1月末，中央已发出了解放军“支左”的命令，所以县武装部一时成了全县的最高领导机构，政府的工作都以县武装部的名义进行。春耕是农业县的大事，耽搁不得。我们的“革命热情”理所当然地得到武装部的支持，我们也就打着“敦煌县人民武装部抓革命促春耕宣传小分队”的旗号，下乡吹拉弹唱了。

上午临出发时，忽然所里派来了车，在文化馆门口贴出一张大字报，以党员李振甫领衔署名，后跟五个战斗队，就是在县委发起公开会的那几个，内容是“要求”我立即返所“参加运动”，口气还挺硬。值得注意的是，大字报只提了我，并没提所里其他参加小分队的人。

本人一向不吃这一套，好嘛！才这么两天，怎么你们还不接受教训，又唯我独革起来，凭什么给我下命令，我不过只是想当个逍遥派而已。我听到一个说法，说是若遇挑衅，已别无退路时，就不能犹豫，必须迎头痛击，而且首战告捷，方能制敌取胜。如果首战就俯首称臣，你将永远失败，永世不得翻身。离开伊犁时，老司机给我说的实在遇到危险，待在原地不动是最好的办法，这时已经不可能了，回击才是最好的办法。

老荣和大家，还有武装部派来的汽车司机想着早点出发，说不管他，回来再找他们讲理。我说不行，请大家给我半个小时。立刻铺纸濡墨，打着牢牢把握斗争大方向和响应武装部抓好春耕生产的旗号，予以驳斥，洋洋数百言，立马可待。记得其中还有“太史公曰：‘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之类的话，还提出待我任务完成，一定要与李振甫公开辩论、让全县群众公议的挑战。一不做，二不休，大字报还骂了李振甫为“政治低能儿”。写时，大家给我出主意，我说你们别说了，我知道怎么写。写罢，大家帮我贴在他们的大字报旁边，登上汽车，出发了。汽车把我们送到某公社后就开了回去。

但我心自明，他们的大字报只点了我一个人的名字，想起赖团长要我一定要注意的叮咛，我肯定是已经被钉到了某一块靶子上了，今后不会有我的好果子吃。但这个时候，也顾不得那太多了，我对自己，包括自己的应对能力还是有充分自信的。

我们先到了县域西部，各公社人口多的大队几乎走遍了，都是步行。回到县里休息了两天，武装部的汽车又把我们送到东部。最后，又到了县西70公里外孤立的南湖乡。一天换两三个大队，一个多月，胜利完成任务。

农村里极少有文化活动，不过是隔几个月看到一次电影放映队带来的《地雷战》、《地道战》那么几场露天电影，还有各家各户安装的小喇叭。我们去了，宣传的内容先不说，权当是一次

娱乐，也引得孩子们高兴，所以小分队到处都受到热烈欢迎。大家吃得饱，睡得好，再没吃到四清时吃的那种汤汤水水的东西，可见纯厚的敦煌农民，自有自己的判断标准。

宣传的程序一般先是大队长致欢迎辞，感谢领袖关怀，给他们派来了宣传队，大家热烈欢迎。再由老荣的天津话领头，有时是我，向“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请示汇报，三呼万寿无疆和敬祝副统帅永远健康毕，接着朗读抓革命，促春耕的文件，再开始正式演出。那几个女老师其实还都是些孩子，确实厉害，在文化馆自编自导，只排了两天，就弄出了四五个像模像样的舞蹈，加上几支独唱合唱，老荣来两段天津快板，插进几个乐器独奏合奏，包括我的手风琴，一个多钟头，却也热热闹闹地对付过去了。合奏曲中，我们把西北群众最喜欢的陕西眉户戏的调子串成了一组眉户调，最受欢迎。小分队有一位会一边拉二胡，一边吹口琴的角色，也受到农民喜欢。最后以一曲《喜洋洋》作结。完了以后总会得到经久不息的掌声，于是再合奏一曲《步步高》，圆满结束。只是在合唱中，那几位小学女老师把语录歌“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中的那个“的”字唱成为“得”，虽说发音是对的，却把轻声特别加强，显得有点怪异。

现在的年轻人当然不会理解这些，只崇拜周杰伦、刘德华什么的，还有我怎么也记不下名字的流行歌手，那个时候，我们这些土洋结合的玩意儿，在某种程度上，也的确满足了农民的文化渴望。

小分队里的当地人说，敦煌县各大队甚至各小队的口音都不大相同，东边和西边的差别更大，但我听不大出来。原来现在的敦煌居民是雍正三年从陕甘五十六个州县迁来的，不是汉唐敦煌居民的后代。迁来时各地的人聚居在一起，形成了不同的口音。有的地名还多少与原居地有些关系，如秦州户、肃州户、河州堡等，应就是来自天水、酒泉、临夏等地人的聚居地。城里人的话是四乡话的融合，可以说是甘肃的标准音。以前有一个甘肃话的广播电台，播音员必定要在敦煌城里找，播起音来全省都能听得懂，就是这个道理。

在南湖公社，不知道谁提出来的，说还有一个叫“崔毛堁”的地方，也应该去一下。听这个地名，就有点怪怪的，那是一个小队，在南湖西边二十多公里的沙漠深处，得骑马去才能到达。大家一听可以骑马，高兴坏了，都嚷着要去。公社准备了十几匹马，不够，有的一匹马得驮两个人，一大清早就出发了。路上，我可是真开了眼界，还从来没有见过这么荒凉的地方，全是戈壁，间有沙漠，空气透明得无以复加，天空特别明净，而声息全无，我们仿佛落到了月球表面。远处寸草不生的石山也显得特别异样，因空气之透明虽远而显得特近特大，在山的背后似乎隐藏着什么巨大的不可知的怪物，真产生了“鬼影憧憧、魑魅四伏”的幻觉，感到一种说不出的恐怖，真想象不出在这种地方怎么还会有人类居住。一个多小时后有人说到了，却什么也没看见。仔细一望，才发现不远处露出一一点绿色，原来是几棵白杨的树尖。到了跟前，发现是一个六七十亩大，深二三十米的地坑。下到坑底，才见到十几二十户人家，跳出几个孩子，居然也有鸡犬之声。

这是一个“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地方，几十个村民中，到过县城的屈指可数，顶多只到过南湖，十几岁以下的孩子连南湖都没去过。说的话我们有些也听不大懂。考了几个孩子，只知道领袖的名字，一问刘少奇、邓小平，都只会摇头。问他们是哪国人，知道是中国人，再问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哪个国家，却又摇头了。问到汽车、火车，一概听不懂。孩子们摸着我的手风琴，不明白这个盒子怎么会发出声音，我每按出一个音，他们就全都开怀大笑。我们去“宣传”，对他们来说真是天上掉下来的大馅饼，百年不遇的大节日，全村的人一个不落地全部到场，虽完全不懂得“文化大革命”和“打倒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什么意思，却全都开心极了，但不会鼓掌，全都嗷嗷地叫，表示欢迎。据说他们祖祖辈辈都住在这里，已经上百 years 了。小队长在南湖有亲戚，小时在南湖上过初小，说他们的祖先是汉族，后来又来了一些蒙古族，现在

也说不清哪家是哪族了。因为近亲血缘，基因退化，已经显得痴呆。当时我就想，如果有人类学家去研究一下，肯定会有特殊的发现。

我想，就凭这次经历，我参加宣传队的这趟辛苦也值了。没几年以后，听说这个地坑被水淹了，淹得很惨，已无法居住，政府把他们全都迁到了南湖。

这里没法容留我们，完了就赶紧往回赶，不想天黑了，在戈壁滩上晃了大半夜，迷了路，大家挤着走在一起，招呼着，谁也不敢离队，最后只得在一处避风处休息。第二天凌晨，爬起来一望，原来已经到了南湖跟前，正在阳关烽火台遗址下面不远处。

三

1967年春末，我回到所里，革命群众已分成了两派，两派都忙着“革命”，抓“大方向”，而且都指责对方“不革命”，不抓“大方向”，颇有点两党政治的意味。

一派成立得稍早，就是给我贴大字报的五个战斗队合成的，有十几个人，头面人物就是1965年才来所的比何山低一班的同学樊兴刚，其精神领袖则为贺世哲。这一派以后参加了县里“敦煌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敦总”）这一大派。

另一派也有十几个人，但比前一派稍少，由原来单独活动的三个战斗队合成，成员中大概有一些是工作组在时揭发过贺世哲的人。以后此派参加了县里“敦煌革命造反联合司令部”（简称“敦联”）。

敦总以中学红卫兵为主，敦联则以党政干部组成的党政兵团为主。前者敢打敢冲，符合江青路线，应属真正的“革命造反派”。但敦联的优势在于党政兵团掌握的资源较多，更重要的是得到了县武装部的支持，这一点具有绝对的意义。

所里其他群众自忖有点历史问题的还有十几位，咸有自知之明，极力保持低姿态，哪派都不参加，但感情上倾向敦总方面。

这里要插一句话，在高尔泰先生写的《寻找家园》一书里，说敦联这一派是以何山为首的，其实不对。奸猾而懒惰的何山要说有“派”，也只是“摘桃派”，只是有时与敦联派有点来往，与敦总派从不答话而已。这也很容易理解，他正是贺世哲被整下去以后才侥幸得以继承大统的，与前任有直接的权利冲突关系。

我刚回所，哪一派也不参加，自己却成立了一个战斗队，名曰“韶山”，连队长带队员，敝“战斗队”只有敝光杆一人，因为串联时全所只有我到过韶山，独一份，颇以为傲，自诩独得真传，故以名之。我为什么也要成立“战斗队”，无非是要争得一个平等的地位罢了，并不真的要跟谁“战斗”。

我的左邻是北大历史系毕业与我同一年来到研究所的马世长，参加了敦联这一派，平日因住得邻近，他为人又比较随和，与我的关系一直挺友好。右舍是老实人王柄，也参加了敦联一派。王柄的家在农村，孩子挺多，有一回他说他不敢回家，我和世长兄问为什么，他笑迷迷地说：“今几个的女人真怪，你就不敢碰，一碰，就给你又生下来一个。”我们听了大笑。

我这个“韶山”，贴出大字报宣告成立以后抓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向李振甫喊战，要求到城里大圆盘（就是东十字）公开辩论。李振甫也是中央工艺美院壁画系毕业的，何山的同班同学，

安徽人，出身贫农，在学校就已是党员。其实振甫兄虽说在那张大字报上领了个头，却是一位不失农民本色的本分人，一向低调，惟一的爱好就是画画，其他一概不置可否。没见他跟谁红过脸，一辈子也没见他写过文章，更没写过派性大字报，文革中其实是位高明的逍遥派，并没有存心与我为难。他之所以领了个头，实际上只是因为他是党员，一时失察，作了敦总派的工具，被推到了前面。他无心应战，说只同意在所里辩论，后来连在所里辩论也不愿意了。我转而向敦总派挑战，却因对方自知理亏，没人应战，此事便以我的全胜而作罢。

记得还是我在展览组工作期间，振甫兄陪着兰州两位外调人士来找我，说是要我谈谈我在兰州的一位党员同学李鸿懋的情况，尤其是其反动言行。我谈了半天，东拉西扯，说他喜欢听轻音乐，喜欢画画，看美展之类，他们不得要领，提醒我来点“反动”的，我说实在想不出。他们便要我回所里找找还有没有他给我的信。我要振甫兄陪同回屋查找，以示“公开”，振甫却不当作一回事，只在我屋里坐着看画册，并不监督，使得我有机会背对着他迅速翻阅，找出几封无关紧要的交出了事。这件事我牢牢记得，至今深为感谢。可我却在一时气头之下骂了他，实在过分，在此借机对他致以歉意。

以后，我也参加了敦联派，这不仅是我的两位邻居朋友都是这一派，更在于我自己的判断，根本的原因还是世哲兄一向的唯我独革的极左思维不能使我认同，再加上敦总派的咄咄逼人，就更令人厌恶了。当我的文字实力在敦联派逐渐得以显示后，听说敦总派内部总结，认为他们自己的策略出了问题，低估了萧某人，没有把本来站在中间的萧争取过来，把我“逼”到敦联那边去了，使敦联派气势大振。这个认识，其实是低估了我的判断力，以为我只是意气用事呢！

四

派战正酣的一天，两派分头宣读县委文件，说是为了贯彻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精神，要清理工作组在时形成的整群众的“黑材料”。敦煌县本来就不大，可能除了研究所和县中学以外，都没有派出过工作组，县委派来一位干部，驻在所里，主持清理工作。

来者名叫刘绍祖。

刘绍祖，县委组织部副部长。我在县里的交游虽说还算广泛，却也是头一回见面。看来也就三十左右，中等个头，不胖不瘦，白净面皮，文质彬彬，戴一副宽边黑框眼镜，颇有仪表，很有知识分子的风度。说话温文尔雅，不多而极有分寸，赢得大家好感。

他召开全所大会，除了“常李王高”，全都到了。会议在中寺前院两棵老榆树下进行。刘绍祖再一次传达了文件，宣布要成立“黑材料清理小组”，他自己任组长，还有其他四位成员，分由党支部、行政和两派各推选一位代表组成。代表的条件很简单，只要是文革前期工作组在时没有写过揭发群众的黑材料者就行。请大家酝酿，今天就推举出来，明天开始工作。这一次因为是号召群众“自己解放自己”，不再强调过去一定会列为首要的“根红苗正”的条件。

两派分头开会。

在我们这一派的会上，找来找去，符合“没有写过揭发群众的黑材料”条件者只有敝人一个。我不但对群众，就连“常李王高”的材料也没有写过，以后也没有。这不但是运动初期我不在所里，更在于我对于“揭发”尤其是“政治揭发”这类幕后行为本就没有兴趣，“错误地”认为是宵小之行，不登大雅。工作组曾经来人到县阶级教育展览工作组动员过所里的人积极检举，我就从没当过一回事。于是，当然地，我成了敝派的代表。

对方选了一位运动初起号召揭发时就到北京探亲的人，北大历史系考古专业毕业比世长高好多班的孙女士。

已经名存实亡的支部由李振甫代表，其实他在所里连支委都不是，但书记李承仙，支委常书鸿和王佩忠都被打倒了，支委中还有前文革组长贺世哲和一位苏木匠，却都写过揭发材料，只得由他来代表了。

管农活和杂务的孔金算是行政方面的代表。老孔来自敦煌农村，勤于事而纳于言，认真踏实，只知道成天干活，可能根本就搞不清这是在搞些个什么名堂，对开会极不耐烦，经常借口安排农活而不参加。

对于“黑材料”一词，我感到新鲜，而且还要从“档案”中把它抽出来重新加以“清理”，更加觉得新奇，真是旷古未闻之事。对于中国知识分子来说，“档案”可是具有非比寻常的意义，平时你几乎感觉不到它的存在，但一到关键时刻，它就会必然出现，而且总是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有关我们的这几张要命的纸片，却从来没有与我们照过面，但却追随了自己一辈子，隐隐操纵着我们的命运，实在可怕得紧。《三国演义》中载有一事，传为千古佳话，说是官渡之战以后，发现一批曹营文武写给袁绍的效忠信，报给曹操。大家战战兢兢，担心小命难保，哪知曹操哈哈大笑，当着众人的面，也来了一次“清理黑材料”，竟将这批东西未拆封地一把火全都烧了，赢得众官之心，此后死心塌地地为他卖命，再无二心。我想，领袖果然不凡，必是博览群书，当然知道此事，“清理黑材料”用在此时，正是最恰当的时机，必会赢得全国人心，更增对刘邓的痛恨，真雄才大略之举也！

第一步先要讨论出一个“清理办法”。大家拟了几条，大致是：凡有关“常李王高”的保留不动、凡工作组整的针对群众的外调材料和结论全部烧毁、凡革命群众互相揭发的材料也予烧毁，但不得泄漏检举人的名字和内容、凡群众自己写的交待材料退回本人、凡事涉经济问题和建国前历史问题者暂时保留，运动后期处理。此外还有只有刘绍祖才可以打开档案袋，从中找出上列各种材料，进行分类，再交全体代表过目无误。过目时只能露出题目不许看内容。

“清理办法”讨论了三天，天天都要回去征求各派意见，再反馈回来。未参加派者的意见可自行到小组提出，但没有收到过。其人人参政的民主程度，也是建国以来所无。期间，各人利害关系不同，对条文有所争议：有的说事涉经济的也得烧，有的说有关生活作风问题的应该暂时保留，后期处理，不一而足。最后总算大家都同意了，经济问题者暂留，生活作风者烧掉。有保留意见的觉得太坚持了可能对自己反而不好，也不再坚持。

我盼着有人提出高尔泰来所以以前就已摘帽，不能仍算右派，应与其他群众同等对待，但始终没人提这个事。我自己不能提，因为我与高尔泰过从甚多，人人皆知，由我来提只能坏事。

清理工作进行得还算顺利，但出现了一个问题，却使过程耽误了好几天。

问题偏偏就出在关于我的一批材料上：文件套里装着，一厚摞。

我没有揭发过别人，工作组也没有让我自己写过交待，至于是不是有人揭发了我或工作组是否对我有过外调或结论（后来证明都没有），自可按上述“办法”处理，不关我的事。但这一厚摞却有点特别，是当初讨论“办法”时谁也未曾想到的。

这是我在新疆两年工作期间和运动以前写给分配到哈密和兰州的两位同学的信。哈密的那位前已提到，叫袁同恺，天生一个浪漫主义，平生最好发议论，以上世纪50年代末中苏两党

共同声明的文件为据，对《九评》持有异议，为苏修的老赫头辩护。还把烧了几个洞的床单自己补起来，别出心裁没事找事地缝成花朵状，像是梅花，也犯了忌（虽说是领袖在1963年12月发表了《咏梅》，但袁氏此举却在《咏梅》发表之前）。运动一来，有人针对他。为了向党证明自己不是修正主义，他竟主动把自己的日记和同学给他的信全都交了出来。我给他的信不少，也在其中，包括我那些无事生非地写的破诗，都转到所里来了。在兰州的那位是党员，就是前面提到的李鸿懋，因为在《实践论》的学习会上主张领袖也不是天生的，是从实践中产生的，被指为反对领袖和副领袖的“天才论”，也被揪出来了，直到宣扬天才论的陈伯达在庐山被领袖亲自打倒以后才平反。不过听说他也无所谓，正式平反以前大家早就不把他当外人看了。我给他的信是造反派从他家里抄出来的，也转来了。

我说，这些信是我自己写的（按现在的说法，就是“著作权”应归我所有），适用于“凡群众自己写的退回本人”的条款精神，应该退回给我，从中找出自己的毛病，“自己教育自己”。孙女士则坚持“凡群众自己写的”的规定有一个前提，是指在工作组的强迫或号召下写的交待材料，这批信既没人强迫，也没人号召，更不是交待，不能适用此条。而且既然寄出去了，就不归写的人所有了，所以应该保留，运动后期处理。我说保留下来想干什么？关键不在于“工作组”三个字而在于“群众”这两个字，现在批判资反路线，就是批判整群众，质问她我是不是“群众”，留下来是不是还想整群众？我们两个就这么争起来。

当然，我没有拿“隐私权”作为理由，当时还没有这个词，更不敢有这个概念。

振甫和孔金都不说话。

老刘也没说话，沉吟着。看争不出个结果，最后说了：“你们二位把问题带回去，征求一下大家的意见。”

我们派说，他们还想干什么，这不明明是还想整人吗？有的说，不能让步，要不就把所有材料都公开，一件件让大家评论过关。有的针对他这个意见说，你这个办法不行，人人过关，不还是资反路线？

第二天，我把意见带到会上，对方仍然坚持，又吵了一上午，情况与上次一样。

第三天一开会，刘绍祖首先发了话：“事情我有责任，事先没有想到还会出现这种情况。你们二位说的都有道理，但是我们要始终牢牢掌握斗争的大方向和伟大领袖的战略部署，不能再发生整群众的事件，领袖的著作要活学活用，对条文也不能抠字眼，那样不利于运动的深入发展。《十六条》也有规定，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不愧为党工干部，句句查有出处，无懈可击。他接着说：“这些信我昨天晚上全都看了，也没写什么，全是一般的关心问候和生活情况。我的意见是既不还给本人也不再保留，我提议结合‘办法’规定的工作组整的外调材料予以烧毁的总的精神，全部烧毁！当然，这些材料不是外调来的，但性质与外调相近。”

紧接着，从不主动说话的李振甫也说了话：“我同意老刘的意见，大方向始终不能错。”显然，老刘事前对他打过招呼，运用了基辛格的穿梭外交。

老刘问：“老孔，你的意见呢？”

“嗯！听刘部长的，就这么着。”算是老孔的回答，心里惦记着所里的羊，觉得这些羊比什么“材料”重要多了。

孙女士不敢连“大方向”都不顾，含糊了一声，也没再坚持。我知道，其实孙女士也并非

要成心与我过不去。

最后问到我，想不到我竟说：“到底写了些啥我也忘了，我是真的为了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最好还是退回本人。”

老刘满怀怜意地看着我，摇摇头，无奈，宣布暂时休息。

五

开会是在厨房对面客人用的小饭厅，厨房隔壁就是大饭厅。趁孙女士不在，老刘递给我一支烟，径自走了，暗中拉了我一把，我尾随着他，到了大饭厅。一掩上门，他就小声说：“老萧，你怎么跟你的那些个同学一模一样，还这么‘猪’啊！退回给你对你有什么好处？谁说得清楚这场运动是怎么回事，还会怎么变？趁现在一把火烧了，一了百了。退回给你，将来形势一变，你说是交还是不交？要是你自己烧了，可不又成了你的罪状！再说，我就不明白你干嘛要写那些信？掐头去尾，少说也可以找出你几十条罪状，什么‘今天五一，大家都高兴，只有我一个人有心事。’这是什么话！幸亏还是五一，如果遇上十一，尤其七一，那就更不得了，人家上纲上线，你能说得清楚？你还写了那么多诗，什么‘孤儿行’的，你也说得清？真是，写那些个东西干嘛？你知道县委刘凤山是怎么揪出来的？”又说出了两句更惊人的：“什么‘大方向’！就那么靠得住，谁知道他下一个‘战略部署’是什么？什么‘群众自己教育自己’，你就真那么相信？”

几个问号砸过来，有如五雷轰身，醍醐灌顶，令我震惊莫名，把老刘佩服极了，真不愧在组织部门干过几年，虽说年龄与我也差不多，却比我这个书生成熟得不知多少倍了。我一辈子坏事就坏在“书生”这两个字上了，永不能“成熟”，直到写这篇文章，也还是这样。鲁迅说“人生糊涂识字始”，俗话也说“百无一用是书生”，都是一点也不错的。我还特别惊异于他怎么能跟我说这么些掏心窝子话，我们并没有深交，看来是为了救我，他也是实在顾不得了。

当时，我只能忙不迭地点头。

这只是在不到三分钟内说的话，继续开会后，一致通过：这批信全部烧毁。

两棵大榆树下，再次召开大会。老刘发表了一通讲演，字正腔圆，有板有眼，赞颂伟大领袖高瞻远瞩，明察秋毫，革命群众应该步步紧跟。庆祝伟大领袖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又一伟大胜利，彻底砸烂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反动路线。然后有条有理分门别类地汇报了清理结果，包括具体数字。最后把应烧毁者丢到老榆树树池子里，浇上汽油，当着众人一把大火任由祝融先生把它们全都送上了兜率天宫。烧了好久，还用棍子来回翻搅，生怕不彻底。

口号声起，全所欢呼。

老刘说的那位县委干部刘凤山，原是组织部干事，喜爱文学，在民勤参加四清时收集了一些民谣，以存“采氓风以察民情”之古训，备以为日后创作的参考，其中就有诸如“草绳麻绳都是绳，地主富农也是人”之类的话。文革开始不久就有人揭出来了，二话没说，定了个铁板现行。割腕自杀未遂，老婆离婚，儿子带走，自己则落得个三开除（党籍、公职和城市户口），成了个疯子，在街上对人傻笑。每天必会定时扒在前妻的院门外面，从门缝张望放学回来的儿子。听说上世纪80年代平反时，老愚已不知悲喜矣！

至于我那句五一节有心事的话指的是1965年五一节，所里开天辟地以来第一辆轿车改装好了，头天已从兰州开回城里。常老发动全所年轻人，自己带队，上午先爬鸣沙山野餐，然

后步行50多里进城，下午坐轿车回所，含“忆苦思甜”之意。大家高高兴兴，而我恰好在此时收到了前面提到过的新疆那位“特殊的朋友”的来信，随信寄来一大包新疆特产去掉核壳的李广杏干，信的内容却是不愿离开她的民族，不能履行前约了。

听说以后老刘调安西任县委书记了，民誉甚高，没有受到什么冲击，但我们也再没见过面。应该说，老刘是我的又一位恩人。

为什么我不承认这本小书是所谓“伤痕文学”？因为它重于陈述人性和社会。人与社会都有其复杂性与多面性，这本书更着重的还是颂扬人性和社会的正面。

我前面谈到的赖子隆、刘绍祖，后面将要谈到的郑绍荣、白雁玲，还包括李治安、孙一心和钟圣祖，全都是县级党员领导干部，都代表了人性中正面的力量，是这本小书着意描写和歌颂的对象。其中多位还是在我的经历中千方百计对我进行过保护的“贵人”。这些“贵人”，与我以前并不相识，更谈不上深交，在整个文革过程中，他们先后出场，却都凭着自己的良心与理性，多次在我濒临没顶之际，对我伸出了援救之手，没有他们，我早就身陷罗网了。通过他们，包括上层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一批老干部，我也才更深刻地体会到，在党内，从中央到地方，一直存在着一种冷静的理性的正面力量，虽然暂时还处在一种弱势的状态，但在他们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仍在与那种貌似强大的邪恶势力进行着有效而巧妙的抗争，挽狂澜于既倒，延续着中国的历史。其厥功至伟，令人尊敬。

如此，这本小书，怎能以“伤痕文学”目之？当然，我也丝毫没有贬损优秀的“伤痕文学”之意。

我忽然想到了一个新词，沽名之曰“维持会效应”，适用于心存善良只想当好人却不得不摆摆姿态以维持“大局”的好干部。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其特征必然是两面三刀，心口不一，人在说人话，鬼在说鬼话，干的可件件都是人事儿。我们都知道闹日本鬼那会儿的维持会长，虽说电影里都说他们个个儿都是汉奸，我们也镇压过不少，但我相信，其实在实际生活中，应该就有着这类人物。

说到电影，此时我又想到了一部，但没看过，说不准听到的情节是不是完全准确。说的是一位村支书被分配到一个光荣指标：要他在村里抓一个反革命！这位事事响应号召的支书这一回可是犯了难，数着指头挨家想去，谁都不是反革命：哪家太穷，要“进去了”，全家准得饿死；哪家从祖上起就几代积德，实在于心不忍。想来想去，只有一位单身汉的条件堪称优秀：首先是光杆一个，没有后顾之忧，其次是平时对什么都不在乎，再加上还有点小偷小摸的毛病，并非无懈可击。于是两个人躺到沙地上一边抽烟一边谈条件。单身汉同意当一回反革命，条件是“罪行”不能太多，坐牢不超过三年，挨斗时打得不能太狠，出来以后要村里负责给他找个媳妇，记足工分，分足粮食，还得帮他修好破房子。村支书千恩万谢，样样答应，感激他救了全村。

我看，这位村支书干的事，也大致符合我说的“维持会效应”的定义。

对这类党的干部，我们只能心存感激，表示尊敬。他们并不是懦夫，虽说不上是直面的战士，却也是在一种特殊情况下的人道主义精神和中国传统文化优秀部分的施行者。我们这个民族之所以没有被外来的并曾经独霸几十年的“斗争哲学”彻底征服，而仍然葆有“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的基本道德种子，就曾也得益于他们的韧力。

□ 摘自《一叶一菩提——我在敦煌十五年》

~~~~~

## 【人物春秋】

靠上海写作组“造反起家”的徐景贤

• 朱通华 •

“文化大革命”中，上海市委写作组和北京两校大批判组，是“四人帮”的两支反动笔杆子，臭名远扬，罪恶滔天。正如中共十一大的政治报告所点名定性的：它们“连篇累牍地炮制反动文章，宣扬这个反革命政治纲领，充当‘四人帮’篡党夺权的急先锋”。

江青曾经声称：“林彪有舰队，我们有炮队！”上海的这个写作组，就是“四人帮”篡党夺权的一支“炮队”。它由张春桥、姚文元一手培植起来，并始终置于他们自己的直接控制之下。

上海写作组正式成立于1971年7月，但它同以徐景贤为支部书记的上海市委写作班，同以朱永嘉、肖木、王知常为核心的《红旗》杂志上海组稿小组，有着不可分割的历史渊源。因此，当我们翻开上海写作组的兴亡史时，必然会看到徐景贤、朱永嘉、肖木等这些人是如何走完造反起家——大乱上海——自掘坟墓这个历史过程的。

### ◇ “徐老三”造反

1967年以后的10年，上海滩有谁不知道有个徐老三？徐老三，即徐景贤，上海奉贤县奉城人，解放初期在南洋模范中学读书，1951年被抽调到上海市委宣传部文艺处工作，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文化大革命”前担任市委写作班支部书记。

1966年11月，正在埋头为当时的顶头上司——市委宣传部长代写检查的徐景贤，在张春桥、姚文元（此时两人均已进入北京的中央文革小组）的直接指挥下，一夜之间杀将出来“造反”，向上海市委夺权。从此以后，徐景贤步步高升，直到做了中共中央委员、上海市委书记，成为位置仅在张春桥、姚文元之后的上海的“老三”。这就是人称“徐老三”的由来。

徐景贤的“造反史”，从复旦大学红卫兵揪斗朱永嘉、姚文元深夜打电话开始。

朱永嘉，原来是复旦大学历史系教师、系党总支委员，那时被借在上海市委写作班，用“罗思鼎”的笔名发表文章。1966年11月25日，复旦大学红卫兵将朱永嘉揪回学校，勒令他交代在学校里的修正主义言行，交代在上海市委写作班炮制的修正主义文章，并勒令写作班交出文章底稿。

“文革”之火烧到了上海市委写作班，如果让它烧下去，就将烧到张春桥、姚文元头上。写作班负责人徐景贤急急忙忙打电话给中央文革小组，向张春桥、姚文元告急，表示要起来“造反”。

张春桥接到电话后说：“很好。”接着说：具体做法，我们要研究一下。

张春桥、姚文元同中央文革小组的另外几个成员王力、关锋、戚本禹等密谋以后，在11月29日由姚文元出面给徐景贤回了电话。

姚文元在电话里说：复旦大学的造反派“要追查罗思鼎的后台吗？后台就是张春桥！后台

就是姚文元！来揪好了！”他还说：“戚本禹听到了这个消息也很吃惊，他要送大字报到复旦大学来！”这个电话，徐景贤当时记在了笔记本上，是这样记录的：

宣读（在左派中宣读）姚给丁（即丁学雷，徐景贤常用的笔名）电话：

（1）听说复旦党委顽固地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搞罗（思鼎）小组，揪朱（永嘉）。姚（文元）、张（春桥）惊讶！关（锋）、戚（本禹）气愤……（2）根本是：根本问题，话要讲得硬，本单位、本校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朱的问题为什么要突然批判？要追根子，就是要追张春桥。

姚文元电话的口气是严厉的，意图是明确的：（一）中央文革小组坚决保朱永嘉。揪朱永嘉，就是要追到张春桥头上，不能允许。（二）火要烧到复旦大学党委的头上去，给它戴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帽子。

很快，形势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朱永嘉被救出来了，罪名完全落到了复旦大学党委的头上去，并且连累了市委教育卫生部和宣传部，统统被造了反。

张春桥、姚文元并未就此善罢甘休。12月12日，姚文元又打电话给徐景贤，问：“市委写作班是继续写文章，还是上第一线？”所谓上第一线，就是要写作班起来造反，不仅要造复旦大学党委的反，还要反上去，反到上海市委的头上去。徐景贤得到了这么个“大气候”，心花怒放，觉得这回造反的“苗头”是越造越大了。

12月14日晚，徐景贤召开写作班全体会议，传达张春桥、姚文元的“指示”，并讨论怎样造反。当时有三种意见：第一种意见是写作班的人各回自己的原单位去造反，第二种意见是造市委宣传部的反，第三种意见是造上海市委的反。讨论了一个通宵，取得了一致意见：全体造反，直攻市委。

徐景贤向大家表态说：革命更觉北京近。我们要紧跟春桥、文元同志，紧跟中央文革小组，造上海市委的反。春桥、文元同志这样关心我们，我们不能辜负春桥、文元同志的期望。

在他的煽动下，有人站起来大喊：“春桥、文元同志叫我们造反，我们不能再拖了，不能再做上海市委的奴隶了！”有人出谋献策说：“写作班是个堡垒，战壕可以通到各个单位去，如通到办公厅、教育卫生部去，串联他们一起造反。”还有人说：“我们要抛材料，拿出真枪实弹，里应外合”，“要同中央文革小组直接联系”。

写作班杀出来造反以后，立即同上海市委的机关刊物《支部生活》造反队合并，成立“上海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这个造反组织，在后来的“一月夺权”中起了很大的作用。

姚文元一步连着一部。在写作班决定全体造反后的第二天，即12月15日晚上，他又给徐景贤下达了进一步的指示，着重指出了造反的策略和前途：“曹荻秋从八届十一中全会到现在，态度肯定是非常顽固的。你们在策略上要比以前更多考虑，以求效果更好。”

姚文元点出要害说：“大方向还是先搞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但不能停留在仅仅搞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上，还要准备挖得更深，准备把陈丕显、曹荻秋挖出来，把上海市委打倒。”

有了姚文元的交底，徐景贤等人的胆子更壮了，放手大干了起来。12月18日下午，“上

海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在文化广场召开了“批判上海市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当时华东局和上海市委的负责人，都被揪到会场批斗。大会提出的口号是：“炮打上海市委”、“火烧陈丕显”、“揪出曹荻秋”、“打倒杨西光”、“砸烂常溪萍”。这些口号，是徐景贤同北京大学的造反头头、当时正因造反串联在上海的聂元梓，按照姚文元的口径商定的。张春桥后来曾多次表扬说：“这个口号很有策略！”

徐景贤在大会上作了《造反方知主席亲》的发言。这个发言，实际上是个“三突出”的发言：突出吹捧中央文革小组，突出吹捧张春桥、姚文元，突出吹捧他自己。此外，大会还宣读了《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班造反声明》（以下简称《声明》），进一步亮出了他们的决心，也公开亮出了写作班与张春桥、姚文元之间的关系。《声明》这样说：

我们——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班全体工作人员和市委文革小组成员徐景贤（丁学雷小组负责人）、朱永嘉（罗思鼎小组负责人）郑重声明：我们要造反，我们要造上海市委顽固推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我们要造上海市委内部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大反特反，一反到底！

《声明》还说，从批判《海瑞罢官》开始以来，他们就在张春桥和姚文元等人领导和带领下，在革命小将造反精神的教育下，进行战斗了。

大会以后，这份《声明》贴遍了上海的街头巷尾，颇引人注目。张春桥对此举十分赏识，一再说：像徐景贤、朱永嘉那样，才是真正的造反派。

这次大会以后，以徐景贤为头头的“上海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实际上成为张春桥、姚文元操纵上海市的“文化大革命”并向上海市委夺权的一个工具；在张春桥、姚文元“一月夺权”成功以后，又成为他们身边的工作班子。徐景贤也就此跳进了上海政治舞台的中心，成为一个在张春桥、姚文元直接操纵下舞大刀的重要角色。

◇ 张春桥委托徐景贤为他“找个伴”

1967年1月4日，张春桥、姚文元从北京回到上海，把“上海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作为他们的工作班子，徐景贤越发感到脸上光彩，身价提高。

造反造到1967年底，“上海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中形成了两派。有一派反对徐景贤，一度使徐景贤的地位岌岌可危。关键时刻，张春桥提名徐景贤为上海市党章起草小组的负责人之一。这实际上是张春桥发出的信号，表明他是信任和支持徐景贤的，从而使徐景贤的地位转危为安。1969年中共九大以后，徐景贤扶摇直上，升任中共中央委员、上海市委书记。从此，徐景贤看得更加清楚了，张春桥、姚文元是他能够站住脚并得以高升的大后台、大靠山。

当然，张春桥也有批评徐景贤的时候，有两次还批得很凶。但批评也无非是为了让他站住、站稳，少出纰漏，更加俯首帖耳而已。徐景贤与张春桥的关系究竟有多深？张春桥对徐景贤的信任达到了什么程度？这里举一件具体事例，足以说明问题。

1976年2月下旬，中央召开“批邓打招呼会议”。2月26日晚，张春桥找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谈话时，提出要他们替他找两个秘书。徐景贤回上海以后，就物色了两个男干部，整理成两份材料，经马天水、王秀珍看过后寄给张春桥。

3月，张春桥寄给徐景贤一封“亲收”信，内有两张信纸。在第一页上，他说：收到两位

同志的材料后，觉得他们去了以后，可能没有太多的事情，还不如在外面多干一些事情为好。第二页是单独写给徐景贤的，张春桥在上面写道：

老实说，我要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秘书！而是想找个伴。关于我的情况，你是知道的。这几年来，有时想，反正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杀头了，何必去想这些事情呢？但有时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于是又想起了这件事。你看，有没有合适的人呢？

信的末尾写明：上一页可以给其他同志看，这一页请阅后烧掉，免得引起不愉快的事。

张春桥是一个阴鸷、深沉的大野心家，居然能把“找伴”的事委托给徐景贤来办，可见对徐景贤的倚重和信任了。对这件事，徐景贤后来这样说：

我收到信后，想起1974年王洪文来上海时，专门和马、徐、王谈了张（春桥）要和他的老婆文静离婚的事，理由是文静有历史问题。我觉得这是张春桥的一块心病。但不知道他要找的对象是什么条件，想有机会去北京时和他面谈，因此耽搁了一段时间。后来我根据我的了解，物色了政治上较好、又有一定文化程度的对象，想当面征求张的意见是否合适后，再和女方谈。一直到（1976年）9月21日我去北京卫生部开会后见到张，我向他介绍了对象的情况。他当时听了说：以后再讲吧！到了10月1日，他忽然在我写去的关于电影《反击》问题的一封信上，批了一句话：你上次提到的某某单位的那位同志的材料，能否送来一阅？于是我就积极把材料在10月6日寄去了。

真是无巧不成书。“四人帮”在1976年10月6日垮台，徐景贤正于这一天给张春桥寄去了“伴”的材料。1976年粉碎“四人帮”以后，徐景贤被审查期间，这件事始终成为他的一块心病。

◇ 批判《中国画》，矛头指向周恩来

1973年前后，周恩来总理为了把对外贸易抓上去，针对那些极左思潮，明确指示：工艺美术品只要不是反动的、黄色的、丑恶的东西，都可以组织生产和出口，要内外有别。并指出：把这些东西卖给外国人，我们换回外汇，支援社会主义建设，有什么不好？因此，周总理亲自过问了宾馆布置画和外贸出口画的问题。到了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开始时，“四人帮”出于攻击周恩来、篡党夺权的需要，就杀气腾腾地向宾馆布置画和外贸出口画开刀了。

江青首先发难，张春桥、姚文元紧紧跟上，文化部的于会泳赶紧给徐景贤打电话通气。1974年1月初，姚文元在上海对马、徐、王等人发表口头“指示”时，忽然拿出一本《中国画》的画册要大家传阅，自己还指指点点，一幅一幅地横加批判，什么“这是黑山黑水”啦，“这只公鸡的尾巴翘到天上去了”啦，“这是一本地地道道的克己复礼的画册”啦，咬牙切齿，杀气腾腾。

徐景贤得了风就扯篷。3月6日，他用市委办公室文件的形式，抛出了“市委领导同志对《中国画》的意见”。徐景贤写道：

这个《中国画》的画册，集中暴露了我们外贸工作和美术工作中的严重问题……

总之，在外汇面前，我们的某些同志右倾投降，拿出这样的作品不以为耻，反以为荣，题为《中国画》，作为伟大的社会主义中国人的气概跑到哪里去了呢？

3月20日，上海两报（《文汇报》、《解放日报》）同时发表由徐景贤定稿的题为《一本地道道道的复礼、翻案的画册》的长篇文章。3月28日，徐景贤又给两报下批示：“批判《中国画》的版面还要继续搞几版，版面可标通栏：‘深批克己复礼，击退美术领域的复辟逆流’，以和北京即将展开的批判相衔接。”嗣后，上海两报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大批特批，篇篇都经徐景贤审定。徐景贤还组织了“坏画”展览，开了几千人的批判大会，紧锣密鼓，热闹非凡。

在《中国画》这本画册里，有一幅名为《迎春》的画被他们骂得最凶。在徐景贤亲自授意炮制、修改定稿的一篇文章中，专门有一段文字批《迎春》：

这幅画突出地描绘了一只怒气冲冲的公鸡。这只公鸡喙紧闭，冠高竖，颈羽怒张，双爪抓地，翻着白眼，怒目而视，尾巴翘到了天上去。……这哪里是在迎春，完全是对社会主义的春天，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后所出现的欣欣向荣的景象的极端仇视。

在这只公鸡身上，寄托了今天社会上一小撮“复辟狂”的阴暗心理，他们不甘心自己的失败，随时随地准备同无产阶级决一死战。

徐景贤和这篇批判文章的作者，不仅给这幅画定上这么吓人的政治罪名，而且给画家戴上了“复辟狂”的“反革命”大帽子。那么，《迎春》画的作者是谁呢？是南京艺术学院的陈大羽教授。陈教授是一位政治上、艺术上都很过硬的老画家。徐景贤有什么权力，事先根本不同江苏省的有关组织打任何招呼，就采用突然袭击的卑劣手法，把棍子打到邻省的一位党员教授的头上？徐景贤的恶毒用心，当然不止是针对陈大羽教授个人，还有着更大更多的目标，无非就是想通过打击兄弟省市的文艺作品和作者，进而用“揪后台”之类为借口，达到稳住上海、搞乱全国的罪恶目的。

上海写作组从1971年7月正式建立开始，到1976年停止活动为止，在紧跟“四人帮”的道路上走了五年有余。它的手伸得很长，伸到上海的各条战线，还伸到全国许多地方；它的毒放了很多，从历史到经济，从宣传到文艺，包罗各个方面。它办帮刊，写文章，抓文艺，作调查，修党史，编课本，搞翻译，无所不包，样样插手。刊物办了8种，计有：《学习与批判》杂志、《朝霞》月刊、《朝霞》丛刊、《自然辩证法》杂志、《教学实践》杂志、外国文艺《摘译》、外国哲学经济历史《摘译》、外国自然科学《摘译》。文章发表了800篇左右，其中《红旗》杂志上发表了76篇，《学习与批判》上发表了774篇。其范围之广，能量之大，危害之巨，是相当惊人的。

□ 原载《党史博览》

~~~~~

【自由论坛】

罪名与文革——文革思想遗产断想

• 顾 土 •

中国历次政治运动，其实都是依靠五花八门的罪名发动起来，又通过大大小小的罪名不断延续的。在中国政治运动史中，罪名之多、罪名之繁、罪名之奇、罗织手段之丰富，可谓集古今中外之大成，而文革中的罪名，数量、花样、创新、奇特、严酷诸方面，更是登峰造极，空前绝后。中国的罪名可以编一部大词典，其中，百多年来创造的罪名占据多一半，而在这多一半里，文革中的罪名数量、花样与使用频率又最高。

一场政治运动的发动，其原因就是怀疑、预设或是蓄意渲染一种威胁的存在，威胁的主体即所谓的敌人。认定这部分人为敌人，当然必须先要设定罪名，有了罪名就可将敌人打倒批臭，直至肉体消灭。

罪名可分为两种，一种是对现象，即行为和言论的划归，比如资本主义复辟、修正主义、机会主义、反党；另一种是对具体人的认定，如三反分子、走资派、叛徒、特务。事实上，这两种罪名在整个文革中往往混合使用，难分彼此，对某个人，既可以安上“主义”之罪，也通常要具体定为某种“分子”。后一类，当运动发展到极为残酷的时刻，就显得特别盛行，达到了泛滥的程度，因为此时最需要用具体罪名将“运动对象”置于死地。

因为有了一堆的罪名，才得以发动文革，而文革又创造了更多的罪名，可谓罪名成就了文革，文革又孕育了罪名。罪名是文革的合理依据，文革也是罪名的合理载体，相辅相成，互为推进。当文革发动者和既得利益者自己也因文革而被扣上各种罪名时，文革即寿终正寝了。研究文革史，可以专门写一部罪名史，从罪名的设立到演变，可以基本看清文革的大致轮廓。

一、历史的延续

文革中的多数罪名在中共历史中已存在很多年，经历了各类运动的不断运用，在整肃异己的实践中，屡试不爽。左倾机会主义、右倾机会主义、唯心主义、投降主义、分裂主义、反共分子、反革命分子、变节分子、剥削阶级、资产阶级、反动派、托派、特务、叛徒、工贼、内奸、地主、富农等等，尽管这些罪名不是文革的新发明，甚至有些还不是中共的发明，但在文革中依旧是使用最频繁也是命中率最高的罪名，一旦归入这些罪名之下，就失去了做人的任何权利。由于常年的批判和斗争，这些罪名早已臭不可闻，在人们的心目中，只要与此沾边，无须考虑，就形成了一种“该人应该打倒，他人应该划清界限”的思维定势。

文革前的17年，各种政治运动持续不断，每个运动至少都有一至数项罪名盛行，这些罪名，来源不一，各有起因，有些被文革继承发扬。

1950年，镇压反革命运动开始，一个反革命的罪名足以囊括当时的所有敌人，判决最重，死刑也最多。这一罪名既来自历史，又不断延伸，文革时达到顶峰，无所不在，有历史反革命，也有现行反革命，还可以在其他各类罪名前面冠以反革命，如反革命修正主义、反革命经济主义、反革命阴谋集团、反革命两面派，甚至在“一打三反”中还出现了反革命杀人犯、反革命强奸犯等罪名。

在1952年的三反运动和1953年的新三反运动中，贪污、浪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与违法乱纪，是当时的罪名，有人被处以极刑。由于这些罪名缺乏意识形态的浓重色彩，在阶级斗争日益残酷的岁月里，逐渐显得无足轻重。尤其是官僚主义，虽然是文革前多次政治运动的打击对象，但在文革中却从来不算是一项罪名，最多只是批评别人时的一种说辞。至于五反斗争中所设定的那些罪名，“行贿、偷税漏税、盗骗国家财产、偷工减料、盗窃经济情报”，与阶级斗争相比，更不值一提了。

1954年，全国兴起了批判胡适的运动，唯心主义是一大罪名，这一罪名一直发展到文革，成为文革中一项满天飞的帽子。

1954年中共七届四中全会召开，酿成了所谓高饶反党联盟一案。反党联盟这一罪名后来被反党集团所取代，或许因为集团比联盟更具贬低意义，所以联盟这一说法在文革中未曾出现。

1955年，胡风等人被定性为反革命集团，于是，“胡风分子”与反革命划了等号，但“胡风分子”的指向过于明确，文革中反倒很少利用。

1957年的资产阶级右派和1959年的右倾机会主义是当时的重大罪名，其中右派的影响尤为深远，与地富反坏并列，文革中仍然沿用，另外还加上了一个“漏网右派”，也是文革中的罪名之一。

“四清”运动之前，各类政治运动构置的罪名相对比较单一，反右运动反的就是右派分子，反右倾斗争反的就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即使三反和五反，罪名也不外那几项。而自“四清”运动始，政治运动的罪名变得芜杂起来，并且还不时变化，前后不一，而这也正是文革的罪名特征。

1963年2月，中央工作会议确定，在农村普遍进行一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城市开展五反，设定的罪名是贪污、投机倒把、铺张浪费、分散主义、官僚主义，基本没有脱离五十年代的运动框架，但随着9月“阶级斗争为纲”成为指导方针后，罪名就不断升级、演变。1964年底，“官僚主义者阶级”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人”这两大新罪名出台，官僚主义因此上升为“吸工人血”的反动阶级，很快，资产阶级、修正主义、大毒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等等罪名，铺天盖地，终于与1966年之后的罪名相衔接，融为一体。四清运动，仅从罪名看，也足以视为文革的前奏。

文革中对领导干部最惯用的罪名，也是最重的罪名，就是反党集团，这一罪名文革前已经盛行，不但中共中央有彭德怀一类的反党集团，而且在各系统、各部委、各省市也有大大小小的反党集团被锻炼成狱。文革最初是彭真、罗瑞卿、陆定一和杨尚昆的“阴谋反党集团”，之后最大的就是林彪、陈伯达反党集团。但值得注意的是，刘少奇从未被说成是反党集团，而林彪等人于“四人帮”在1976年以后又都被称为反革命集团。

修正主义最初指的是国外，包括南斯拉夫、苏联、东欧各国的执政党和领袖，还有法共、意共、日共等等，苏联在很长时间被称为苏修，与美帝一样，成了铁定敌人。在毛泽东的话语里，修正主义是个十分严重的罪名。

1957年2月，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他将修正主义与右倾机会主义视为一体，说成为“一种资产阶级思潮，比教条主义有更大的危险性”。从1962年中共八届十中全会起，修正主义的罪名开始转向国内。在全会上，毛泽东认为，在中国，人民群众也有同修正主义的矛盾。“中国的右倾机会主义，看来改个名字好，叫做中国修正主义。”1963年，中国的修正主义罪名日益具体化，毛泽东说在城市搞五反，在农村搞“四清”，就是挖修正主义的根子。到了文革前夕，由于毛泽东反修防修思想的迅速传播，在全国造成了修正主义的严重危机感，而“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的一再提醒，也使修正主义变为最现实的危险，经反复宣传，修正主义终于成了最为严重的罪名，而且实际指向越来越明确。中共历史上的所谓两条路线斗争，其反面的路线也已经由过去的左右倾机会主义逐渐改称为修正主义。

修正主义的罪名，在文革时期，基本是泛用，“三家村”的邓拓、吴晗、廖沫沙，“四家店”的彭罗陆杨，都被称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当“五一六通知”出来后，修正主义成了文革的主要目标，文革所要打倒的一切敌人都成了修正主义分子，所要批判的路线，也都成了修正主义路线。刘少奇是“中国的赫鲁晓夫”，自然就是中国修正主义的头子，他代表的也就是修正主义路线。1971年，毛泽东说：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修正主义的罪名开始指

向林彪等人。1975年和1976年，在“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和“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中，修正主义的罪名又成了邓小平的专属。

二、现实的需要

文革中还独创了很多罪名。十年文革，每年都有新的罪名产生，而组成文革的各类大中小运动也都各自发明了不少罪名。还有一些罪名，尽管不起源于文革，但在文革中又赋予了新的含义，扩充了新的内容。

1966年3月，毛泽东指责北京市委和中宣部，称北京市委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中宣部是“阎王殿”，吴晗、翦伯赞是学阀，彭真是“大党阀”，不久，《三家村札记》受到批判。从此，独立王国、阎王殿、学阀、党阀、三家村黑店成为一种罪名，泛滥一时。

1966年5月7日，毛泽东发出著名的“五七指示”，其中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一旧有罪名因而再次盛行于全国的学校和研究机构。

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一年后公开发表，“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反动学术权威”、“资产阶级反动思想”、“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赫鲁晓夫式的人物”等等一批罪名风行全国。

5月25日，北京大学的聂元梓等7人贴出受到毛泽东热捧而轰动全国的大字报；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陈伯达亲笔修改的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6月2日，《人民日报》全文刊载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并配发评论员文章；6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放手发动群众，彻底打倒反革命黑帮》；随即，黑帮、黑线、牛鬼蛇神、资本主义复辟等成为普及全国的罪名，各地相继揪出了大量的“牛鬼蛇神”，还产生了专门关押“牛鬼蛇神”的“牛棚”。

8月1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毛泽东在会议期间写下《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推出了资产阶级司令部、形“左”实右等重大罪名。8月8日，全会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其中规定，“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后简称走资派，成为贯穿文革始终的标志性罪名。

红卫兵运动兴起后，势若燎原，当时最常用的保皇派、封资修、黑五类、黑爪牙、三反分子、狗崽子、黑帮子弟、地富子女、封建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等罪名风靡全国。红卫兵发起破“四旧”，即“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在这一罪名的滥用下，抄家、破坏之风刮遍各地。

1966年10月2日出版的《红旗》杂志13期社论中又出现了一项新罪名，即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简称“资反路线”；10月6日，北京工人体育场举行10万人参加的“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誓师大会”，凡是想要打倒的人，或想批判的言论、观点，在这一时期都被划入了资反路线，有的叫执行，有的则称坚持或推行。

1966年底至1967年初，在短时期内还出现过一个新罪名：联动。联动的全称是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其组织者是北大附中、清华附中、八一学校等十几所中学红卫兵的负责人，这些十六七岁的中共高级干部的子弟在1966年底发布联动成立宣言，很快就联合了北京上百所中学的红卫兵，也包括外地的学生，他们成群结队，骑着自行车走街串巷，高呼

口号，张贴标语，散发传单，因内容抵触中央文革，曾被镇压，有130多人遭拘捕。“联动分子”一时间也成为反革命的代名词。

1967年2月中旬，在中南海怀仁堂发生了关于文革问题的激烈争论，事后被定为“二月逆流”，多次举行批判会、誓师大会和示威游行，反击“二月逆流”。尽管这次争论后来被过分夸大，水分不少，但确实酿成了一批罪名，除“二月逆流”外，还有“保护一小撮走资派”、“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刘邓黑司令部的复辟鸣锣开道”、“为王明、张国焘翻案”、“黑干将”等。

叛徒，不是中共的发明，但作为罪名在中共历史上长盛不衰，在文革中更是达到极致，从中央到地方，从机关、学校到厂矿、军队，大量“叛徒”相继被揪了出来，或是投进监狱，或是被监督改造。株连亲友必不可免。

1967年初，中共中央印发《关于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人的自首叛变问题的初步调查》，由所谓“六十一人叛徒集团”开始，全国掀起了抓叛徒的风潮，各类叛徒集团层出不穷，连周恩来都因历史上的“伍豪启事”而险些被打成叛徒。1967年，中央文革发出《关于征询召开“九大”的意见的通报》，其中说，要“把隐藏在党内的叛徒、特务、自首分子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统统清除出去”，最终，在1968年10月的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上，刘少奇被安上了叛徒的罪名，成了中共历史上最大的“叛徒”。刘少奇的罪名同时还有“内奸、工贼”，因刘案而受殃及的人高达2万8千多。

文革前期的5年，曾进行了一系列的运动，或者不是运动胜似运动，有“斗、批、改”、“清理阶级队伍”、“整党建党”、“教育革命”等等，一浪接着一浪，其中使用比较多的罪名有唯生产力论、物质刺激、白专道路、封资修大毒草、洋奴哲学、崇洋媚外、复辟资本主义、修正主义、反军乱军、里通外国、人性论、地主、富农、资本家、叛徒、特务、托派、阶级敌人、反革命分子、阶级异己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国民党残渣余孽、死不悔改的走资派等等。1970年初，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等文件，在全国展开了“一打三反”运动，短短10个月就挖出了“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近200万人，而其中被杀的大量政治犯的罪名是“恶攻”。对于平民来说，这是最重的罪名，即“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包括攻击“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彪副主席”及其他“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领导人）。尽管罪名的具体事实往往并不“恶毒”，只不过表示了一点不满，或是用错一个词或无意间损坏了领袖像罢了。

在1968年前，也就是在“全国山河一片红”、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前，因为造反组织派系林立，政治舞台上的当红人物如走马灯一般，什么都是变幻莫测，起伏不定，所以，各类罪名繁多，五花八门，来源复杂，有上面钦定的，但也有很多是民间自创的，各地方当局创新的，某个组织发明的，历史遗留的。但在1969年，尤其是中共九大以后，罪名的设置权基本归一，无不根据自上而下的指示。

中共九大前后，在全国进行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运动，所以，“五一六分子”在5年内成为遍布中国的一项罪名。凡是在这5年内想要打倒、清除的人物，无论上下，都被划归在“五一六”的罪名之下。“五一六”原本代表中共中央的“五一六通知”，是文革纲领的象征，却诡异地被定为反对文革的罪名。1967年9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姚文元文章《评陶铸的两本书》，毛泽东在其中加了一段话，称“五一六”的组织者和操纵者，是一个用貌似极左而实质极右的口号，刮起怀疑一切的妖风，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搞阴谋的反革命集团。从此，“五一六”变为一种类似现行反革命的重罪，每个时段的内涵、标准和对象均不相同，极其随便。1968年，中共中央成立清查“五一六”专案领导小组，陈伯达任组

长，吴法宪等人是成员，订立的标准是矛头“三指向”，即把攻击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生红色政权革命委员会”。这一时期的“五一六分子”，或是各个派系互相指责的工具，或是单位当权人物打压异己的武器。1970年以后，“五一六”在各地基本上成为造反派特别是较激进的造反派的代名词。“五一六”的后台或操纵者也随着运动的发展而不断发生变化。中共中央《关于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通知》中将萧华、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王力、关锋、戚本禹等人统统说成是“五一六”的操纵者。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之后，“五一六”操纵者又改为身为清查“五一六”专案领导小组组长的陈伯达；而林彪身亡后，操纵者的罪名又落在了他和吴法宪等人的身上。

1970年8月，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召开，陈伯达等人成为批判对象，在随后的批陈整风中，唯心论的先验论、假马克思主义、刘少奇一类政治骗子、野心家、阴谋家、唯生产力论是罪名。1971年9月，林彪、叶群等人身亡，一大批人因而身陷囹圄。随后，中国大地掀起了批林整风、批林批孔等大规模的政治运动，其间还夹杂着评法批儒、批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反潮流、抓大事等各类运动以及从不间断的大批判狂潮。篡党夺权、抢班夺权、反革命武装政变、小舰队、形而上学、复辟资本主义、反党集团、极左思潮、形左实右、无政府主义、修正主义、经验主义、封建奴隶制、孔孟之道、卖国主义、崇洋媚外、右倾回潮、反攻倒算、复辟、招魂，是这些大小运动和批判浪潮中出现频率最高的罪名。

1975年到1976年，即“四人帮”被捕之前，只有大型运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包括“四五”事件时的罪名非常明确，有：正在走的走资派、右倾翻案风的急先锋、修正主义路线错误、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资产阶级民主派、右倾翻案风的总后台、中国的纳吉、反革命暴乱、反党、反马克思主义的大毒草等。其他一些罪名，因权力核心的矛盾尚未公开，所以言辞似有所指，却不明说，只有明眼人心中有数。例如让全世界莫名其妙、令全国不知其所以然的“评《水浒》”运动，罪名就叫“投降派”。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逮捕，此后展开的“揭批‘四人帮’”运动，直至“四人帮”和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被审判，所使用的罪名基本延续了文革，先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篡党夺权、路线斗争、阶级敌人、唯心主义、反军乱军、修正主义、帮派体系，最终又将他们定为“反革命集团”。继以前的“五类分子”、“九种人”之后，又增加了一个新的罪名“三种人”。由此也可以说，这一运动尽管其目的是想结束文革，但其思维方式、操作手段和话语，依然没有脱离文革和阶级斗争的历史窠臼，几乎一脉相承。在文革后的许多年里，文革和阶级斗争的思维方式一直延续。华国锋时代，还有反革命分子的罪名，以至一些不满华国锋的人因而入狱，甚至还有人因“恶攻”罪被杀害。以后的岁月，尽管罪名日益减少，但仍旧有各种所谓“分子”作为监视、审查直至逮捕的对象。

说文革的罪名，不能不提对外。对外所使用的罪名基本承继了文革前，只是显得更为激烈，更加严重。常用的有帝修反，帝主要指美国，修主要指苏联，其中的反，全称是各国反动派，美国和苏联以外那些被批判的国家都属于此列。当时对外的罪名还有“反共反华”、“反华大合唱”、“反华小丑”、“走狗”等。

三、罪名的特征

在法治的社会，没有思想罪，也不可能因言获罪，任何罪名都有法律的详尽规定，无法逾越；在没有法治而有法制的社会，有思想罪，也有言论罪，但罪名设有具体的规范，只是在法制之上还另有人的威权，这种威权可以左右法制。在既无法治也无法制的岁月，思想可以有罪、言论更可以获罪，所有的罪名都没有任何依据和规定，一切以威权为准。文革是一个法治法制皆无的时代，各类罪名无规无矩，思想罪、言论罪畅行天下，同时，又是威权至上。

笼统、空洞、模棱两可、概念不确切、外延极广、描绘艺术化，是文革罪名的基本特征，几乎没有一项罪名具有确切的表述和界定，而且越是夸张，越是丑化，就越叫座。

反党（反对一个政党）本来不应成为罪名，但却是文革的重要罪名，承继了历史，又有所发展。党，当然特指共产党（没听说过反对某民主党派会被称为反党的），但这党的具体含义是指中共领袖个人，还是指党的决议，或是中央委员会、政治局、政治局常委会，从来没有一种确定的说法。如果说党指的是全党，那反党更无从反起。文革前的高、饶和彭德怀的所谓反党，无论心里是否同意，但多数中央委员跟着一起批判却是事实，起码从表面上还可以表明他们的“反党”是与中央委员会不一致。可是文革初多数中共八大中央委员都被划入了反党之列，以致八届十二中全会的与会者里中央委员不足半数，这样的反党已经无法说明所反的党究竟是什么了。

反革命是一个老罪名，甚至后来被铁定为反革命的国民党也曾以反革命当作一种罪名对付异己。自从中国有了革命与反革命这样的词语，从来都没有任何确定的含义，文革也不例外，历史反革命和现行反革命两大罪名同时盛行，可是发展到最后，革命就是自我标榜的口号，反革命则成了打倒对方的武器。尤其是“四人帮”也成为“反革命集团”更令人不可思议。称他们是极端革命还能说通，而说他们反革命则难以解释。反革命这一罪名含混的关键在于革命是否就是一种必须肯定的行动。固有的难道都不好，新立的是否都对？或者新的就一定能够超越旧的？或许还不如旧的？当革命对社会带来的破坏造成灾难时，革命是不是也应该被否定？依据当代词典的释义，革命是“被压迫阶级用暴力夺取政权，摧毁旧的腐朽的社会制度，建立新的进步的生产关系，解放生产力，推动社会的发展”。可是，如此解释更无法说明“四人帮”和林彪、陈伯达等人是反革命。反动也是个老罪名，与反革命相似，根据词典的说法，反动就是反对革命、反对进步，但什么是革命、进步，却是言人人殊。文革时，文革被称为革命和进步，而文革结束，拥护文革、靠文革起家的却又成了反革命、反动。

反社会主义、反马克思主义、机会主义、修正主义、篡党夺权、里通外国、走资派等罪名，同样都是含混不清，为什么刘少奇、林彪、陈伯达等人会反社会主义、反马克思主义，这个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究竟是什么，谁也说不明白。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更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主义，吹捧一个人时，就说他是“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灵活运用”，批判一个人时则可以说他是歪曲、篡改、修正了马克思主义，但“发展”与“修正”之间的区别谁也分不清楚。中共的大多数干部根本不知资本主义为何物，称他们走封建主义、专制主义、小农经济的道路还能自圆其说，可说他们想复辟资本主义，就根本讲不通了。

随意性极强，是文革罪名的一大特征。逃跑主义、分散主义、经济主义，好像是个事情就可以安个主义，一安主义便能置对方于死地。今天说这个是修正主义，明天说那个是唯心主义；今天说攻击林彪的是反革命，明天跟随林彪的又成了反革命；今天称赞一个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明天这个人则变为一贯反共的假马克思主义骗子；今天此人最红最革命，明天他又是阴谋夺权。所有的罪名都是随便一说，为什么使用这样的罪名，既无原因，也无理由。这种随意性还体现在艺术式的夸张形容上，因为文革的当权人物大多是些文艺家和文艺爱好者，艺术夸张不能不成为他们的嗜好，如大毒草、黑五类、政治扒手、游鱼、小爬虫、变色龙、阴谋家、两面派、开历史倒车、还乡团等。这些毫无规范的语言，作为罪名，尤其是决定人的命运的罪名，在文革中大行其道，泛滥全国。而里通外国这一罪名，已经随便到足以让所有与外国沾边的人全部获罪，因为留过学的、出过国的、在外国有亲友的、和外国人通婚的、与外国人有交往的，都算里通外国。

罪名构置的登峰造极，从任何方面，都让文革罪名成为历史之最。莫须有、腹诽心谤、文字狱、大不敬、宁可错杀一千决不放过一个，这些中国罪名史上体现滥杀和专制的语词和行为，在文革中都达到了破记录的程度。嫌疑，是文革罪名最常用的说法，谁都可能落在被怀疑之列，与莫须有异曲同工。为陆定一定罪时以中央名义下发的文件就有“重大内奸嫌疑”的罪名，“特嫌”这一罪名更是遍布全国各地，因嫌疑获罪直至入狱的人远远超过历史上的任何时期。“私心一闪念”、“动机不纯”、“心怀不满”，是腹诽心谤的文革表述；盛行于文革中的“恶攻”罪名，则是大不敬的时代翻版。文字狱早在文革前就已经畅行全国，各种政治运动都是文字狱的经典之作，到了文革，更是文字狱的集大成。从吴晗的《海瑞罢官》到《三家村札记》，再到《三上桃峰》、《园丁之歌》，都是全国性的大文字狱，而各地各单位的中小文字狱则不计其数。整个文革，所有大小运动采用的方式，基本也是宁可错整一万绝不漏过一个，导致冤假错案遍及各个角落，打破了中国历史的最高记录，超过了历朝历代的总和。

□ 原载《记忆》第53期

本期编辑：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CND》总编：
华新民（美国）	思语（美国）	陈天寒（美国）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专用地址：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cnd.org/>
